

◀ (上接8版)

为中美两国正在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即走向全面对抗。国琦教授这本书对我们思考和处理当前的中美关系是不是有所裨益呢？显然，挖掘和书写两国共有的历史可以促进未来中美进行合作，有助于塑造一个中美“共同的未来”。该书结语有这样一段话：“两国共有的历史或许可以为未来的中美关系提供借鉴和指导。希望通过对共有过去更深刻的理解，中国人和美国人能接受这样的看法，那就是，对未来的旅程，一起分享和共同拥有也许会更好。”

赵梅(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美国研究》主编)：我和徐国琦教授结识在1986年，那一年我去南开大学听时任美国外交史学会主席、康涅狄格大学历史学教授托马斯·帕特森的美国外交史课程。南开的此次访学，令我终身难忘。徐国琦教授当时刚刚留校任教，杨生茂先生安排他负责联系和指导我们几个外来的学生。从此，我们开始了以后近三十多年的友谊。记得1999年他来北京办签证，准备去哈佛大学留学。我陪他在北京红都服装店买了他有生以来第一套西服，这套西服陪伴他近30年。

牛大勇老师在会议开头向大家展示的1985年中美关系史学会的合影，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这些中国从事美国研究的学人本身也是中美“共有的历史”的一部分。中国一代一代从事美国研究的学者，薪火相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美国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对美国的认识和理解在不断深化。相较于其他国别研究，美国研究取得的成就是非常显著的。中国所有从事美国研究的学人，这个学术共同体本身，就是中美两国“共有的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书写中美两国“共有的历史”。

越是文化发达的地方越容易倾向于国际主义

李剑鸣(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读这本书是很愉快的，而且读完了也一定会有一些感想。我想有三点，尤其值得我们揣摩和学习。

首先，这本书有一个宏大的观照历史的理念，这就是大家都在说的“共有的历史”。书里所讲的故事，点点滴滴，枝枝叶叶，大家多少都知道一点。但是，放到“共有的历史”这个框架中，这些



耶鲁大学赛艇队，中国少年钟文耀(1860—1945)坐在船头指挥
耶鲁大学图书馆藏

故事对中美关系的意义就大不一样了。这就是这本书最大的学术价值之所在。现在中国学者做研究，越来越缺乏这种对历史的宏大观照，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的能力越来越贫弱。许多文章都陷在事里面，仅仅是“事具始末”而已，缺乏章学诚所说的“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这样的境界。现在，“共有的历史”的理念和方法，在国内学术界的影响越来越大，有的年轻人也要尝试用它来做研究。

其次，国琦的档案研究做得非常扎实，很有原创性。这是他的一贯风格。书里的故事，许多人都讲过，但国琦的讲法不一样。他的素材都来自于档案，每一个细节，每一件事，都有史料作为依据。我们现在做研究，特别是在外国史研究方面，有许多文章不过是把已知的事情重新编排一下，讲一点跟人家不一样的话。没有好的档案研究，没有新的材料，讲不出新的故事，只是一味地“另弹别调”，不可能产生真正有学术价值的东西，对研究也不会有真正的推动。以专著形式呈现的研究，一定要有档案研究的基础，不花工夫对别人不太重视的材料加以发掘，在理解材料时不能独具只眼，写出来的东西肯定是很可疑的。

最后，国琦有出色的讲故事的能力。书里的故事，个个都写得极为精彩。他的故事既有大线索，大情节，也有具体的细节，还有场景描写。我特别喜欢戈鲲化的故事。别看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到哈佛刚两年就去世了，但这里面的情节真是很有意思，有很好的场景感和代入感。国琦讲故事的能力得益于在美国所受的训练。美国好的史家都善于讲故事，而且讲得非常漂亮。过去叫“分析性叙事”，现在叫“阐释性叙事”，都是要通过讲故事来讲道理。这种历史的写法，在我们的史学里也是相当欠缺的。我们的历史学者大多不善于讲故事，讲故事的能力急剧退化，这正是史学最大的危机之所在。年青一代学者读这本书，尤其要揣摩里面的故事技巧，要重视训练自己讲故事的能力。

以上就是国琦的书给我印

象最深的地方。另外，我读完这本书，还有两点别的想法。

第一，书里讲的“共有的历史”，我觉得是一种不对等的“共有”。书里写到的这些事情，比如蒲安臣使团，留美幼童，戈鲲化的故事，古德诺和杜威来华，对于中国历史无疑非常重要，是绕不过去的，只要写这段历史，就一定要写到他们。但是，这些事，这些人，在美国历史中有多大的意义？有些可能根本不会出现，像蒲安臣和古德诺这些人，美国史家也不可能浓墨重彩地加以书写。在这些人的经历中，确实存在两国的交汇点，但是这些交汇对于两个国家的历史意义，是完全不对等的。国琦现在虽然是国际学者，但他的书还是从中国视角来写的；换句话说，他潜在的身份界定还是中国学者。我们今天谈“共有的历史”，展望未来的中美关系，肯定都有中国人自己的角度，这是很正常的。我们作为中国人，当然希望中国能够从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中获得裨益。

第二，在这段“共有的历史”中，我还是看到了不少差异和误解。特别是蒲安臣使团，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桩奇事。清廷在解释为什么派蒲安臣出使时说，天朝派不出会跟西方打交道的人，只好找一个洋人替中国去做沟通联络的工作。在那个时代，中国牢固地自我封闭，再加上通讯、交通、信息传播方面的限制，存在巨大差异的文化之间，沟通和理解的障碍肯定比今天要大

得多。即使在今天，信息传播和交通旅行都非常便捷，我们这个屋子里坐着的人又都对外部世界感兴趣，可是，我们能说对欧美的理解有多么深入吗？我们有多少看法来自不全信息，或者干脆就是出于误解？今天的局面有时也让人想到郭嵩焘当年的遭遇。他出使欧洲回来，发现人家也有些长处，就想讲给中国人听，结果被说成是“卖国贼”。我们多讲一点“共有的历史”，的确有助于克服差异的不利影响，也有助于消除或减少误解。但是，差异、误解、冲突和挫折依然是存在的，我们需要两方面都讲，“共有的历史”才会显得更丰满。

牛可(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在现今这个时候，读徐老师这本书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敦促我们更认真地来琢磨一下所谓“他我之辨”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群，我们和他人的关系怎么样的，我们应该怎么从和他人的关系以及和他人的比较中认识自己，重新审视和更新对自己的固有看法。中美关系史上有一些重要或者有意思的事实被遗忘了，或者没有被有效地纳入到我们的叙事和思考当中。无论是关于历史还是关于当今，都有一些不太靠谱的东西被拿出来当作事实说，广为流传。而这些东西中既有我们对美国的认知中的不准确、不合理，又有我们对自己的认知中的不平衡、不健康。

在历史上的确有这样的美国人，他本来跟中国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专业上也不是研究中国的，但对中国、中国人有不一般的兴趣和情感，甚至投入大量的精力，要为中国做事、帮助中国人。比如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对这样一些人，我其实有时也觉得不是很理解，搞不清这种对中国的兴趣、爱好和情感到底从哪里来。徐老师书中的人和事，还有一些我读到过甚至见到过的一些人，有时免不得让我这个外行想起一个老问题，就是“中美特殊关系”的问题。

老早以前我读孔华润(Warren I. Cohen)《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的历史剖析》，还有伊罗生(Harold Issacs)《美

国对中国和印度的印象》，就觉得这个东西是存在的；后来在不同角落读到、看到的，也不时加强这个感觉。我想，如果把这种“特殊关系”与那些对中国有特别的兴趣、重视、善意和热爱的人——尽管在美国社会中是很少的一部分人——联系起来，特别是考虑到中国在美国精英文化和智识生活中其实是有比较大、比较特殊的地位的，“特殊关系”的说法可以说有其合理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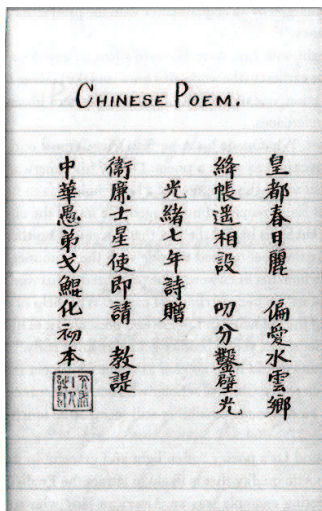
这里可以说个故事。去年我有幸在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参加了一个座谈会，见到一位日本老先生，松尾文夫先生。今年年初这位老先生去世了。松尾先生在1970年代初任共同社驻美国首席记者。他在尼克松访华之前的1971年发表了一篇文章，预言美国一定会和中国重新接近。他在那次座谈会上说，他在致力于告诉日本人，别以为日本可以远交近攻，抱美国的大腿而疏远或者抗拒中国，理由是从历史上、文化上、情感上看，美国最终是会倾向于中国、选择中国的。这是一种文化视角的对国际政治的预见。

他当年的判断是基于这样一个观察：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日美是同盟关系，中美处于隔绝敌对状态，但在美国国务院，日本专家没几个人，水平也一般，却有一大群中国专家，熟悉中国，精通中文，对中国的知识和研究水平很高。虽然老一代中国通在麦卡锡时代被清除出去了，但是这群人是被他们培养出来的；这群中国专家甚至没来过中国大陆，顶多去过台湾，但仍对中国抱有很不一般的兴趣和感情。他大概可以说是一位“中美特殊关系”论者。

中美关系一打开大门，很多像白修德这样以前和中国有渊源的人就回来了，这些人实际上对中美关系，对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构成一种文化资源、历史资源。中国在改革开放中获得相当有利的条件，除了国家间的关系，还有很多是通过一些活生生的个人，通过承载了历史文化渊源中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得到的。里根时期，美国政府表态要支持中国的现代化，而当时这在美国社会中是有相当基础的。特别是在一些精英当中，让中国现代化是一个持久的愿望，也是一个持久的努力，尽管这当中也会有美国中心论和优越感。

回过头来说，历史上美国为什么会出这么一批人？美国的智识生活史中也许存在一些考虑这个问题的线索。我这里只说一小点。大体说来，至少从19世纪晚期以来就形成这么一个格

(下转10版) ▶



戈鲲化写赠卫三畏的诗
耶鲁大学图书馆藏